

# 近代中韓兩國民族主義的類似性

◎ 胡春惠

## 中韓兩民族由自尊到自卑的轉化過程

韓國人雖然自古以來即自知是「東夷之人」，但因韓人久受中國儒家文化之薰陶，一向自認是中國之外東洋各民族中，最有教化的一群，因此以「小華」自居。特別是宋明理學傳入朝鮮之後，高麗朝及李朝的士大夫思想日趨極化，而「夷夏」觀念也漸強，與宋明以後的中國士大夫頗為相似。先則對倭日、對後金在文化上極端加以鄙視，後則也將此一鄙視眼光放在日後東來之歐洲人身上。當1869年，已實行明治維新的日本在國勢蒸蒸日上的情況下，向朝鮮李朝提出平等國交請求時，朝鮮王室卻依然以不屑的眼光，斷然加以回絕，只准其往見地方小衙門的東萊府使，終於導致日本朝野之「征韓論」和1875年的「雲揚號事件」<sup>①</sup>。這與中國清廷與英國在1834年，因遞稟不合體制而演發的律勞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事件如出一轍，其不同者，僅年代之先後與英國之代以日本而已。

1840年的鴉片戰爭及接着而來的英法聯軍，使中國上下漸漸了解世界大勢，知道「天朝」的紙老虎，已無法抵擋住西方的洋槍與大砲，中國的民族主義內涵，漸由以往的「斥洋」轉向「師洋、禦洋」格局。其間雖也有倭仁等人力加反對，認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是「上虧國體，下失人心」，而輒以不談洋務為高，對於那些講求西學者更斥之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sup>②</sup>。他們既執着於中國文化之優越，頑固地認為：「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大法，無不畢具。……其禮教政俗已不免於夷狄之陋，學術義理之微，則非彼所能夢見者矣。」<sup>③</sup>更囂囂然以「聖人之道，不外乎是」，而賤視西方事物。在同一時期之韓國社會中，同病相憐地亦復如是。其中如韓國兩班階級之金平默所發表之〈禦洋論〉中，便說：「故中國之人，我東之人，皆人類也，……西洋之人，皆禽獸也，夫水陸固皆生物之地也，魚出於陸，獸入於水則不終刻必死，何則，失其生道也，然則人類而棄人類之道，從禽獸之教，亦不同於魚之出於陸，而

韓國兩班階級之金平默〈禦洋論〉說：「故中國之人，我東之人，皆人類也，……西洋之人，皆禽獸也」，與中國之倭仁等之不可「以夷變夏」，全然一致，時間上也相去不遠。

獸之入水哉。」<sup>④</sup>與前述中國之倭仁等之不可「以夷變夏」，反對改革，反對模仿西洋的保守頑固心態，全然一致，時間上也相去不遠。

1842年南京條約的締結，是中國人由自尊的地位開始下跌到自卑的起點，在此後近一個世紀之間，中國由高高在上的天朝，跌入一個恥不若人的次殖民地的景況。這對於有着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人來說，真是「亘古未有之變局」。大部分知識分子，在「凜然有悟」之餘，開始放棄往日那種視西洋人為無文化蠻族的看法，開始有承認自己有所短、夷人也有其所長的新思想<sup>⑤</sup>。此後，接連在英法聯軍、庚子之役中，中國幾至亡國，中國社會在驚嚇之餘，竟轉而開始崇洋媚外，趨向於民族自卑情狀。最後孫中山等人不得不大聲疾呼，出而提倡中國之「民族主義」，用恢復「民族主義」來作為「救中國」的主要方法和途徑<sup>⑥</sup>。

韓國在1876年與日本簽訂江華條約之後，基於危機意識，由朴圭壽、朴泳孝、洪英植、金玉均、徐載弼推出了開化運動，開始放棄以往「禁洋」、「禦洋」的鎖國觀念，而走向對外開放的道路<sup>⑦</sup>。先由講求經濟和技術，以求取國家的富強，十分相似於中國稍早展開的自強洋務運動<sup>⑧</sup>，而後再轉入維持與鞏固民族獨立的思想領域，其間也經過崇洋媚外的現象<sup>⑨</sup>，終於演成為「三一」運動中，強烈的反日民族自決的呼聲。

## 中韓近代民族主義的共有特質

在近代史上，中韓兩國民族主義有頗多共有特質，初步可以歸納出下列數點：

一 阻隔了通往世界之路 中國原為世界上文明強國，近世以後，變為「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sup>⑩</sup>。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人執迷於衣冠上國，自視「天朝」的自大自尊意識，其中尤其是滿清雍正朝以後的割斷與西方交流的孔道，閉關自守的結果，使中國從此更不了解西洋的進步情況，而將自己封閉在「中華世界」的陶醉之中。所以在「蠻夷之國，犬羊之性，初未知禮義廉恥，又安知君道上下」的觀念下，自然對歐人的印象極為惡劣，因而即使是天子要求模倣西法之時，類似倭仁、葉德輝這一類唯以中華文明為最高者，便會極力反對學習西洋，認為以夷為師之結果，必致「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sup>⑪</sup>。就在此一倡導者與反對者爭論不休，保守勢力仍大，革新不易直接提出的情況下，乃折衷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及「託古改制」等緩衝論者，不得不走曲線改革的道路。

韓國在十九世紀80年代開化思想登場之初，也同時遭到那些「衛正斥邪」者們的大力撻伐，他們說：「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天下之所以扶持全安者，二帝三王以此參贊化育於中國，……然箕子以此來教於前，太祖以此立國於後，列聖以此相承，先王以此相傳，故為能變東夷之風，得小華之名，此則人道也，若西洋之所謂教，則禽獸之道也。」而視洋夷為洪水猛獸，洋物皆奇

韓人久受中國儒家文化之薰陶，一向自認是中國之外東洋各民族中，最有教化的一群，因此以「小華」自居。



技淫巧之具，「不惟無益，為禍滋大者也。」<sup>⑫</sup>主張安內攘外，拒絕與洋夷混為一體，因而也使韓國開化黨人所推動的韓國近代化工作，遭遇到不小的阻力，最後不得不採迂迴方式，在經過一段「東道西器」理論時段的緩衝以後，才逐漸為多數知識分子所接受<sup>⑬</sup>。這與中國康梁的託古改制和張之洞等的「中體西用」的歷程也完全相同。有趣的是韓國東鄰的日本，僅因為在明治維新中，快速而直接地走向近代化，而為韓國兩班階級斥為「倭洋一體，與洋賊無異」<sup>⑭</sup>。

韓國開化黨人所推動的韓國近代化工作，不得不採迂迴方式，在經過一段「東道西器」理論時段的緩衝以後，才逐漸為多數知識分子接受。這與中國康梁的託古改制和張之洞等的「中體西用」的歷程完全相同。

## 二 激化了仇外的情緒

甲午戰後，中國士大夫眼見國勢之凌替，又因受達爾文進化論之影響，咸認為如不自強即有亡國滅種之禍。於是無論緩進派之康有為、梁啟超，激進派之如孫中山、章太炎，皆倡言強國保種，其中為了激發中國人之種性，不免倡以狹隘的族類思想，一時間，竟使「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sup>⑮</sup>。這當然是與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巧取豪奪有着關連。更何況那些伴隨着大砲闖入中國的傳教士們，他們的傳教說辭既直接衝犯了中國固有的教化，其趾高氣揚的行為，也使下階層的農村百姓直接受到欺侮。於是一種洩憤式的仇外運動，便在1900年澎湃而起，加上其「扶清滅洋」的口號符合了慈禧等人藉人心以對付西洋的心理。此運動雖可以認為是獲得社會下階層支持的純粹對外的民族主義抗爭，然而其焚燒教堂、殺洋鬼

子及教民諸類野蠻行徑，直使人有「東方之人不若西方之人」之嘆<sup>①⑥</sup>。

韓國在雲揚號事件被逼開放門戶之後，在危機意識之下，乃興起民族主義救國論之主張，認為只有提倡民族主義，才是對抗列強之不二法門<sup>①⑦</sup>。此時西方耶教伴同帝國主義進入此一「隱者之土」，觀念差異既大，再加上被認為是披着狼皮早已洋化了的日本，正在朝鮮收奪大量穀物，使韓國三南地區農民，對日本充滿敵意，因而將斥洋與斥倭混成為一體，喊出：「故倭洋之如犬羊，雖五尺之童，羞與同一處者」的激昂論點<sup>①⑧</sup>。在東學教主崔濟愚之神道設教，煽誘「斥倭洋」排外於前，接主全瑋準導之於後，以「輔國安民」為口號，揭竿而起，數萬人蜂擁北上京闕，卻因其打着排外愛國之民族主義招牌，使朝鮮宮廷剿、撫兩派趨向各異<sup>①⑨</sup>。此一烏合之眾的盲目民族主義大軍，終於禍及全羅、慶尚、忠清、京畿、江原、黃海各道，最後導致日本出兵干涉，此正和中國1900年所發生之「義和團」之亂十分相似，只是時間上爆發得更早而已<sup>②⑩</sup>。

**三 催化內部改革和革命運動** 十九世紀後的中國，面對的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環境，她必須在物競天擇的殘酷事實中求生存，這正是清末以來，中國民族主義勃發的催化劑。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傷吾土之不競，憂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無以自存」<sup>②⑪</sup>的前提下，便各憑其才智為國家民族尋求富強之法。而此輩知識分子，又因出身背景與政治觀點不同，略分為漸進式的改革派與激烈型的革命黨。中國在英法聯軍後的自強洋務運動，固然是受到英法聯軍打入北京恥辱的刺激，而戊戌政治的維新，更是先後受到甲午戰敗和德國強奪膠州灣的刺激。自強洋務運動成效雖不算佳，但卻是中國經濟上工業現代化的發軔；戊戌變法雖只百日便告失敗，但卻也肇造了1901年政治再改革之張本和1905年立憲運動之先機。

孫中山等人之革命運動的興起，本就是以強烈的民族主義為本質的。所以在1924年的中國國民黨一大大會宣言中，開宗明義地便說：「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之役，盛於庚子而成於辛亥。」蓋甲午之役，中國竟被島國日本所敗，國人無不羞憤無以自容，孫中山乃以「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sup>②⑫</sup>為訴求，在華僑大眾支持之下，組成了興中會革命團體。庚子之役，八國聯軍佔領華北及東北大部，大局已呈瓦解之危亡情勢，使在海外的留學生及社會中有識之人，紛紛加入革命行列，以圖重光「民族的國家」，終於使革命力量迅速膨脹而形成同盟會。所以我們認為清末出現的中國改革運動和革命運動，均是外患折辱下，中國社會極思擺脫貧弱尋求富強的民族主義反應。

1876年日韓所簽訂的韓日江華條約，雖然日本明言「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之間國平等之權」，但是崔益鉉等儒士，已有「國必隨亡」的危機認定<sup>②⑬</sup>，社會上興起一片「內修外攘」之聲。適於此時，中國洋務派的李鴻章，也勸告李朝同時對歐美開放門戶，以便「以夷制夷」，以毒攻毒。朝鮮乃派遣領選使、修信使及留學生，分別到中國及日本考察，除了參觀「制器」、「練兵」外，在朴珪壽、吳慶錫、金允植等的領導下，也與中國的洋務派和維新派一樣，形成了開化派的改革陣營。然而韓國的開化黨朴泳孝、洪英植、金玉均、俞吉濬

東學教主崔濟愚神道設教，煽誘「斥倭洋」，全瑋準以「輔國安民」為口號，揭竿而起，數萬人蜂擁北上京闕，禍及全羅、慶尚、忠清、京畿、江原、黃海各道，最後導致日本出兵干涉，此正和稍晚在中國1900年所發生之「義和團」之亂十分相似。

等也犯了中國康梁等人年輕氣盛、措施猛浪的毛病，所以其在內政上的改革措施，也只有曇花一現，便在守舊派的反對下，於1884年的甲申政變中宣告結束，使韓國失去了和平穩妥走向近代化的機會。

改良主義的開化運動遭遇挫折之後，韓國經歷了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這兩次戰爭的結果，使日本決心吞食韓國。日本亡韓的步驟，是經過甲午更張、乙未事變、乙巳條約及1910年合邦條約等幾個階段，每一步都加深了來自日本的屈辱，這自然就會引起韓人民族主義的反彈，終於使得韓人不得不走上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之路<sup>④</sup>。《獨立新聞》的出刊與「獨立協會」、「大韓自強會」、「新民會」、「新幹會」、「大韓協會」、「興士團」、「韓國獨立黨」等民族主義運動團體之出現：對於親日韓人及日本重臣之襲殺；以及在韓國各地盪起之義兵武裝抗爭，最後匯結成了李承晚、徐載弼、李東輝、李東寧、呂運亨、金九等人所領導的韓國獨立運動的長期奮鬥。

1918年美國威爾遜民族自決之倡導，使當時部分韓國獨立運動者，也錯誤相信了威爾遜，鼓勵起來韓人的「三一」運動。終於促成了韓國在1948年的正式獨立。

**四 受威爾遜「民族自決」之誤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發生，起自巴爾幹半島民族問題之糾紛，因此當1918年春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際，美國總統威爾遜(W. Wilson)乃有民族自決之倡導，以圖徹底消弭戰禍之根源。威氏此一主張，原是對歐洲現狀悲天憫人之構想，不意卻在東方被壓迫之民族間，引起極大之反響。特別是當時之中國，正值親日派皖系掌權，國人所見到的日本侵略者既佔領山東半島不肯撤軍，又見二十一條狠毒之條件強加之於中國，如今既有美國總統民族自決之主張，不啻視為人類正義曙光之到來。然而巴黎傳來的訊息，竟是以美國為首之列強決定承認日本繼續佔領山東半島之權利，這自然使北京的學生們沮喪和憤慨，因而引發了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五四」運動。這個與威爾遜民族自決誤導有着關連的學生愛國活動，非但提升了中國國民民族主義的情緒，也使中國社會全盤發生鉅變。

遠在1905年日韓乙巳保護條約簽訂之日，張志淵等韓國民族志士便以「是



義和團「扶清滅洋」的口號符合了慈禧等人藉人心以對付西洋的心理。圖為義和團圍攻後的北京公使館區。

日也放聲大哭」等文字對日本統治朝鮮進行反抗，而獨立協會諸人所從事的愛國啟蒙恢復國權運動，雖也極盡努力，但是不久便受到日本強硬式的壓制。1910年8月22日，韓國正式開始日本殖民地式的統治，從此韓人的一切民族意識活動受到限制，而一般下階層農民，也因土地被奪，增高了反日的情緒。1918年1月8日，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論的倡導，在東方的韓國，發生了極大的意義<sup>25</sup>。因為韓人在被日本併吞的過程中，雖然也一再向國際社會申訴，請求給予支助，但是始終不能獲得回應。就在這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倡議，自然成為黑夜中的明燈。所以在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後的3月1日，韓國民族代表33人在塔城公園一帶宣佈韓國獨立，而在其當時投給各國駐漢城領事館的「朝鮮國人民會報」中說：「美國大總統韋利遜(威爾遜)氏聲明十四條以後，民族自決之聲掀動於世界，波蘭、愛爾蘭、捷克等十二國並為獨立，我韓民族豈可失此機會，所以在外同胞乘此以往，以恢復國權張聲泣訴，國內同胞則晏然不動，所以聲援未振，大議未定。念哉！我同胞，現時則係世界改造亡國復活之好機會，若舉國一致堅定而起，已失之國權可以收回，既亡之民族可以挽救，先帝先后兩陛下之大仇極怨亦可以一洗。起哉！我二千萬同胞。」再加上波蘭與捷克皆能在一次大戰後，立即獲得獨立之事實，的確使當時部分韓國獨立運動者，相信坐在巴黎和會席上的列強代表們，將根據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精神，會有一個支持韓國獨立的正義決定。事後當然證明此一想法是錯誤的，但由此一錯誤想法所鼓勵起來的韓人「三一」運動，在經過近二十年繼續不斷的努力後，終於促成了韓國在1948年的正式獨立<sup>26</sup>。

## 結 論

對於一個強國來說，民族主義常常變成對外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化身；然而對於一個弱國而言，民族主義則又成為民族獨立、民族自尊的守護神。中韓兩國在古代雖也曾因文化的優越而藐視過外族他國，然而近世以來則恆處於一種被欺凌、被壓迫的境地。因而我們不難發現民族主義在中韓兩國近代歷史上，經常是發揮着保護國家的功能。義和團事件中，盲目衝動型的民族主義，雖曾使中國面臨亡國的邊緣，但是「民氣可用」的結果，卻也使列強對中國望而卻步，阻嚇了其瓜分中國之意圖。辛亥前後，民族主義雖是革命黨推翻滿清的動力，但是真正喚起民眾，以民族主義作為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工具的，應該是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以後更為顯著。從此，它最激昂，也最具威勢。幾乎是任何人，只要抓着了民族主義的大旗，幾乎便可以打倒他面對的一切敵人。

近代韓國民族主義興起的過程與中國頗為類似。對內，民族主義可以扮演兩班們爭奪政權的工具；對外，則是收回國權，維持自尊的利器。尤其在1876年開港以後的日子裏，開化黨與守舊派，交鄰派與事大黨，親日派與聯俄派，無不以民族主義為政爭進行之主軸。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韓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一大部分是來自日本思想界的培養與啟示。他們誘導十九世紀的韓國精

近代韓國民族主義興起的過程與中國頗為類似。對內，民族主義可以扮演兩班們爭奪政權的工具；對外，則是收回國權，維持自尊的利器。尤其在1876年開港以後的日子裏，開化黨與守舊派，交鄰派與事大黨，親日派與聯俄派，無不以民族主義為政爭進行之主軸。

英去摒棄親中慕華的舊倫理，以便建立獨立自強的新觀念。可是當日本的警察在1905年控制了漢城，設立統監府後，日本的官吏和平民便在朝鮮各道展開巧取豪奪，使得那些韓國精英和平民，急速地再變成了反日的民族主義狂熱者，以義兵運動和獨立鬥爭的形式，來表達朝鮮決不能亡於日本的民族自尊。

當然，民族主義在中韓近代歷史上的影響，不限於全是正面的，而它所產生的負面作用，也頗值得吾人警惕與注意。因為民族主義是野心政治家最易於利用的資本和工具，它極易挑起民族間的仇恨和敵視，更不能像國內政治上犯錯那樣，事後輕易地獲得人們的寬恕。

### 註釋

- ① 申國柱：《韓國近代政治外交史》（漢城：探求堂），頁35-38。
- ②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頁441。
- ③ 張之洞：《勸學篇》自序。
- ④ 金平默：《重菴文集》，卷38。
- ⑤ 李國祁：《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北：時報出版社），頁25。
- ⑥ 孫文：〈民族主義〉第五講，《三民主義》。
- ⑦ 韓沽勛：《韓國史研究》（漢城：一潮閣），頁310。
- ⑧ 李光麟：〈開化思想研究〉，《韓國開化思想史》（一潮閣），頁19。
- ⑨ 如1895年刊行的俞吉濬之〈西遊見聞〉，就對西洋充滿了讚嘆之辭。
- ⑩ 同⑥，〈民族主義〉第一講。
- ⑪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頁133。
- ⑫ 李恆老：〈辭同義禁疏〉，《華西先生文集》，卷3。
- ⑬ 李完宰：《初期開化思想研究》（漢城，民族文化社），頁34-36。
- ⑭ 詹卓穎譯，李元淳：《韓國史》，頁272。
- ⑮ 梁啟超：〈憂國與愛國〉（1899年12月23日），取自李華興編《梁啟超選集》，頁102。
- ⑯ 柴蓮馥：《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弁言〉（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 ⑰ 申采詒：〈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下），《丹齋申采詒全集》，頁108。
- ⑱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東學亂記錄》》，頁116。
- ⑲ 黃璇《梅全野錄》（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出版），頁327。
- ⑳ 韓國各地也曾發生仇洋，殺害教徒近十萬人之風暴，時間在1866年前後。
- ㉑ 係吳汝綸之語，見郭正昭：〈達爾文主義與中國〉。
- ㉒ 〈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及規條〉（1894年）。
- ㉓ 宋建鎬：《韓國民族主義的探究》（漢城），頁79。
- ㉔ 韓國人有時也稱其反日的獨立運動鬥爭為革命運動。
- ㉕ Chong-silk Lee: *The Politics of Korean Nationali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p.101.
- ㉖ 胡春惠：《韓國獨立運動在中國》（台北），頁11。

胡春惠 1937年生，河南人。1972年獲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台灣、香港及韓國，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系教授。著有《韓國獨立運動在中國》、《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中國現代史》等書，另曾發表論文五十餘篇。